

※「禮與倫理」研究群專輯※

「禮與倫理」研究群專輯前言

楊貞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二〇〇二年七月由籌備處正式成所。次年，「禮與倫理」研究群即與「詩與詩學」、「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人文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及後設理論」、「中國文人與社會」，以及「日文漢學研讀」等共計六研究群，在所務會議通過之後成立。「禮與倫理」研究群係由所內五位同人，基於各自正在進行的研究中對於禮、倫理、道德、自我實現和教化等項議題的關懷，和原有相互論學的樂趣，相約組成。大家希望藉著共同的閱讀和跨學科的討論，擴展個人在面對問題時思考的資源，和引起更多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和研究。

禮是人類政治和社會活動的要素，也是理解人文現象的重要工具。西方關於禮的研究，自十九世紀以降，已經發展為不同學科的共同議題。從宗教學、社會學、符號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等各個方向，提出的理論和經驗性研究，不一而足。相較之下，「禮與倫理」研究群則旨在從文學、歷史和哲學等人文的領域，探索中國和日本的相關經驗與反省。也就是說，我們將參考西方的研究，也希望終將提出帶有跨文化意涵的討論，但首先擬進行的工作主要在於：經由細讀中國或日本思想與文化中的文字性文本，檢視禮與倫理在中國和日本的具體內容、問題性、以及重要意涵。

就中國的歷史和當代經驗而言，「禮」一詞泛稱人與人相處之間必要、但又可能異化的關係及其具體形式。它所關涉的不只是人倫日用，也是權力與政治；不只是傳統禮治，也是現代工商、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文化；不只是經世與哲學的論述，也是宗教乃至於美的表現。「禮與倫理」研究群目前的研究範圍係以清代（17-19世紀）思想與文學和日本近代思想為主。之所以選擇以清朝和日本近代為期，首先

* 楊貞德，本所副研究員。

固然是由於參與成員各自的研究專長和興趣。但同樣重要地，晚明與民國恰是中國歷史上反對傳統禮教的兩個高峰。清代位於這兩個高峰之間，將近三百年來關於禮教的肯定、反省和質疑，對於我們梳理「禮」的性質、所面對內發的問題和外來的挑戰、以及因應問題和挑戰時出現的變化，將有很大的助益。對照於中國的情形，日本近代的變化除了也出現對於禮和倫理的關注與反思之外，更演變出與中國近代相當不同的發展。說明和釐清日本的這些現象和相關考慮，因此將既能增進對於日本面臨西方和現代生活挑戰的過程與方式的理解，也有助於經由中、日之間的比較，進一步省思「禮和倫理」所具有的現實和理論性意義。

至於所以取「禮與倫理」為主題，則主要基於成員的共同關注。亦即：我們擬就「禮」之為形式和倫理之為實質的特徵與相互關係（包括它們如何地結合與分離），或檢視近代中、日思想與文學中相關的具體禮儀之內容、形式、功能和意義的種種討論，或探究時人如何思考「禮」之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作用、所倚賴的傳播方式和媒介、以及所具有的文化和歷史意涵。目前各人進行的研究，約可歸為五項。一、經由清初至清中葉的戲曲創作及評點，思考其中對於禮教之內容、及其與個人自我認同和自我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反省和批判。二、經由清代戲曲劇作與劇論中倫理教化思想之審美化與世情化趨向，探討其中文人主體展現與社會意識之互動，以及藝術創作之「雅俗兼容」問題。三、經由清代的小說與筆記文本，釐清作家藉由禮教的表現和闡述，所詮釋的倫理價值和所擬成就之文化、社會，和政治意義。四、經由晚清知識分子關於禮、法和倫理等社會上不同制度性結構的討論，說明「禮教」在這時所面臨的碩大威脅，和「法」與「倫理」的地位因此而升高的現象與意涵。五、透過日本近代(1868-1945)對「忠」、「孝」、「儒教」、「倫理」等語詞的理解和詮釋，比較中、日禮教文化的異同，並解析中、日知識分子的論述、思想、行動及其與具體歷史狀況之關聯性。

「禮與倫理」研究群成立近二年中，多所獲益於應邀前來之國內外九位學者的專題演講和座談。這九位先生和他們討論的主題依序為劉述先先生：「卡西勒論藝術」；林毓生先生：「問題意識的形成與理念（或理想）型的分析」；周啟榮先生：「『禮』的英文翻譯與儒家倫理的研究」；陳弱水先生：「中國歷史上『公』的觀念——一個類型的與整體的觀察」；子安宣邦先生：「先王之道禮樂焉爾——關於徂徠的禮樂論」；商偉先生：「由《金瓶梅詞話》到《儒林外史》」；藍弘岳先生：「丸山真男論荻生徂徠」；戴璉璋先生：「從《樂記》探討儒家樂論」；呂

妙芬先生：「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的清代思想史解釋」。

其中，林毓生和劉述先兩位先生的演講紀錄，以及戴璉璋和子安宣邦兩位先生為演講特別撰寫的文稿，在按照主題的性質重新排序之後，合成了本次專輯的內容。林毓生先生多年來再三強調「問題意識」和「提出重要問題」在追求學術發展上的關鍵性功能。然而，什麼是問題意識？（是否只需以答問的方式思考或組織文章的結構？）如何提出重要的問題？（問題的重要與否只是個人各自的判斷、或者另有客觀的基礎？）如何使具體個案的討論具有比較廣泛的理論性意涵？林先生在回答這些研究方法的困惑上，選擇從實踐的層面闡釋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的理念（或理想）型概念。他一方面說明「何為重要的問題？」和「如何在人文領域中提出重要的問題？」，並經由指出理念（或理想）型分析的意義及其有效運用的條件，解說「如何解答問題」；另一方面更以晚近社群主義者對於人權理念的質疑，以及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所謂國民性和如何實現民主等議題，例示分辨真問題和假問題的方式與其必要性。

劉述先先生早於一九五五年譯出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之《論人》一書，並首先應研究群之邀，介紹卡西勒的為學方法和特色。卡西勒在回答「什麼是人」這一問題上，強調人是符號的動物，並循此發展出「符號形式哲學」，用以說明人類文化的內容和特徵。符號形式哲學是否（或如何）有助於更深入理解中國禮治的現象？探究中國的禮治是否（或如何）有助於省思西方哲學人類學所提出的文化哲學？劉先生的演講將是我們日後思索上述問題的起點。演講中除了說明卡西勒之重視「功能」的哲學取向、結合「發生」和「結構」兩種進路的思考方式，以及強調「形式」的重要性及其變化之外，另且針對研究群中文學組同人的背景，解說《論人》書中〈藝術〉一章要旨，期使卡西勒哲學因此更容易親近、也更具相關性。

戴璉璋先生曾任文哲所的籌備處主任，在獲悉「禮與倫理」研究群成立之後，特別提醒我們留意禮與樂的密切聯繫。誠然，如果音樂是禮不可或缺的一環，則需如何理解它在禮的脈絡下，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功能？音樂之中既重形式亦重內容和既重曲調且重技藝的兩項雙重考慮，以及其中所反映出人為與自然兩種力量交合的現象，對於理解「禮和倫理」與「禮和修養」又具有那些意義？儒家歷來禮樂並稱。戴先生在演講中即以《禮記·樂記》為重心，說明儒家早期樂論的要旨。他討論的重點包含：禮和樂如何經由「通情」、「達理」兩項原則的相濟互動，而達

致教化的目的和體現美與善合一的最高境界；以及《禮記》書中如何以主張「純淨的天性」為基礎，說明人為造作的禮樂係根源於自然（天性）、相契於自然（天地之道）、並求反歸於自然（身心之純正）。

子安宣邦先生趁著應邀抵臺開會之便，另作安排和我們討論日本思想家荻生徂徠(1666-1728)的禮樂主張。儒家的禮樂觀在不同的時空和文化脈絡下，如何具有不同的意義和扮演不同的角色？它究竟能成為近代追求發展的助力或阻力？荻生徂徠不僅曾被引為日本近代思想的開始，並且以主張禮樂著稱，乃至於被溯為日本新法家的根源。子安先生的文章旨在說明徂徠「先王之道禮樂焉爾」說的歷史脈絡和意義，特別是徂徠藉此挑戰既有孔子和《論語》的神聖地位，以及此一挑戰因為引起日本儒者的反響，反而成為他們重構儒家同一性的觸媒。文中也明白指出徂徠重「名」和強調制度源之於人的外部這兩大取向。

本次專輯是「禮與倫理」研究群共同活動的初步成果。我們十分感謝林毓生、劉述先、戴璉璋、和子安宣邦四位先生在此給予我們的支持和鼓勵。專輯中所展現關於研究方法的省思，和禮樂之為形式及其中所關涉主觀和客觀、人為和自然，以及人的內在和外部活動之間的交互作用，將成為我們思考禮與倫理相關議題時的重要資源。研究群的網頁日後將持續報導我們的活動（網址為 <http://140.109.24.171/liethics>），期能藉此進一步推動禮與倫理的相關研究，並加深大家對於「禮」這一具有豐富意涵之人文和社會現象的理解。